

伦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生机勃勃，到处都在前进。六十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第二，从众多鲜活的事实以及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中，我深深感到：我们的党，无愧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我们的国家领导机构坚持为民、务实，清廉、高效，就能够把全国各族人民的组织程度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充分发挥全体公务员和十几亿人民的创造力，善于坚持真理、纠正失误，勇于战胜困难，求真务实，改革创新，实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

正因为这些难以忘怀，才使我感到作为党的理论、党的历史教研人员有一种崇高的责任，必须笔力奋起，写出一部反映新中国的大变革、大转折、大发展，把历史、理论、现状有机联系起来的绚丽书篇，为以史育人、以论资政做一点有益的实事，这就成为我的一个心愿。

实现这个心愿，现在看来需要两个重要条件：一是遵照毛泽东倡导的“一教二著”的办法，把我在中央党校三十多年来为进行党史和党的理论教学研究而撰写的上百个专题文稿和发表的文章集中起来，挑选二十一个专题，进行必要的文字修改，增删部分，改写部分，这本书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二是得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编辑室主任编审曲炜同志的帮助，九州出版社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同时，原党建部主任、博士生导师陈登才教授给予协助和审读，多方面地提出修改意见。所以这部著作得以同广大读者见面。

本书出版得到中共党史教研部同志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在此特表示谢意。

书中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陈雪薇

写于中央党校2010年5月

目 录

自序 /1

- 第1讲 中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 /1
- 第2讲 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 /29
- 第3讲 高岗、饶漱石事件的真相 /39
- 第4讲 50年代中期冒进反冒进之间的斗争过程 /57
- 第5讲 党和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全过程 /66
- 第6讲 中共八大的历史功绩 /82
- 第7讲 1957年反右派斗争新论 /89
- 第8讲 “大跃进”运动的全过程 /103
- 第9讲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制定、实施及意义 /125
- 第10讲 “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思想文化工作反思 /134
- 第11讲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的经济建设 /155
- 第12讲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探索 /189
- 第13讲 在历史伟大转折点上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206
- 第14讲 1979年中共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始末 /244
- 第15讲 “文革”结束后的两件大事：平反冤假错案与调整社会关系 /274
- 第16讲 20世纪80年代初制定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 /287
- 第17讲 经济建设的曲折历程、伟大成就与历史经验 /305
- 第18讲 建国以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确立、演变与改革过程 /331
- 第19讲 思想文化建设的思考 /358
- 第20讲 正确处理现代化建设重大关系的提出和跨世纪纲领的制定 /382
- 附 录 开创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394

随后，毛泽东先后写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三篇重要著作，确立了新民主主义完整的理论，既回答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一系列的基本问题（性质、动力、对象、领导权、前途等），又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征和纲领，把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来。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毛泽东再次明确申述，这种形式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这个论断，显然说明毛泽东认定未来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必由之路，在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要通向社会主义社会，中间必须经历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理论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的重要发展，也是解决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大国走向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的新的理论创造。

党的七大肯定并开展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规定了党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这对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理论的完整形成奠定了基础。

七大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七大的一般纲领是：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新民主主义政治，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在政权组织中，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经济、政治、文化都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明确指出：实行这个纲领，可以把中国从现在的国家状况和社会状况向前推进一步，即是说，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

议的结论中。周恩来把这个结论在党内广泛传达了。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经毛泽东修改和审订的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准确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这里提到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即头3年加三个五年计划共18年。

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正式作出决议，批准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同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通过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这条总路线的基本思想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载入了宪法。根据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所规定的总任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央人民政府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这是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所规定的总任务的一个重大步骤和宏伟规划。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1953年9月8日，周恩来曾指出：“这个问题本来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我们就认定新民主主义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共同纲领》中虽然没有写社会主义的前途，但这是因为考虑到当时写上去还不成熟。……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把它更加明确起来，使它具体化。”^[1]因为，“现在开始五年经济建设，国际国内形势都是有利的，提出过渡时期的问题，也是适时的。”^[2]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列举了三点：

1. 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
2.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国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
3. 我国个体农民，特别是土地改革中所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下中农，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发

[1]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4页。

[2]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8页。

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采取农业机械化和其他新技术，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对农产品的需要日益增大，一方面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支援日益培植，这也是促进个体农业向合作化方向发展的一个动力。

这三条理由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对这几个方面的估量应如何作出科学的、全面的分析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例如，对民族资本主义的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如何估计？对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如何估量？对农村两极分化如何估计？对生产力落后的大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怎样认识它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怎样估量中国农民的两重性等都值得作周密的研究和具体分析。

总之，以上三条理由正确反映了国内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三）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

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已有大体的规定。例如，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基本矛盾和主要任务；新中国的经济成份以及党的基本政策；新中国必须强化人民民主专政等等。但是，还要看到，毛泽东和党中央“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而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它对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基本理论是有所发展的，这些都具体反映在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里。

第一，明确地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在中国就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时期。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过渡性质的社会。要完成这个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大约15年左右，加上经济恢复时期的3年，则为18年。到那时，中国就可以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新民主主义社会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来对待，原来中央考虑也没有这种看法，这是近年来党史学界有人提出的观点。

第二，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两大任务并举，还明确两者之间是相互关联而不可分离的。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主体，三大改造作为两翼，正确地摆正了以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任务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同时又注意到应积极地、有步骤地变革生产关系，以解放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从“利用、限制”发展为“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首创。

发制人的办法征服或排挤安子文及其他同志，以此同高岗的分裂阴谋活动相配合。他一方面故意将安子文草拟过一个政治局委员“名单”，受到处分一事传播出去；一方面有意攻击安子文对财经会议有抵触，并以此含沙射影捏造刘少奇对财经工作会议的态度有问题。当中央发现饶漱石这种错误做法，予以制止时，饶漱石亦毫不悔悟，并公然拒绝中央的干预，继续进行这一蛮横无理的斗争。

1953年9月至10月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任务是用总路线的精神检查和总结过去几年来中央组织部的工作，研究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统一调配干部，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审查，加强党对国营企业的领导，继续完成整党建党的任务等。

饶漱石利用他的职权，极力转移会议的中心。他对近年来中组部的工作成绩轻描淡写，对缺点肆意夸大，无限上纲。他利用整党问题，制造纠纷。他把安子文草拟政治局委员“名单”一事，向组工会议人员散播，千方百计要把安子文同志搞垮，达到整垮刘少奇的目的。他还竭力散播安子文同志的种种坏话，声言要改组中组部的领导核心，并预谋要点出刘少奇是安的“后台”，实行公开“摊牌”。

中央为了制止饶漱石等人的分裂活动，立即停止了大会的进行，专门召集了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开会，把问题摆到桌面上。中央负责同志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同志参加了领导小组会议，并出席了组工会议闭幕大会，作了重要的讲话，他们充分肯定了组织部几年来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强调了全党团结的重要意义，并要求到会代表认真向各级党组织传达中央这个指示。中央已经观察到种种不正常的迹象。中央采取了这些措施，有力地打破了他们利用会议反对中央的阴谋。

第四，1953年底高饶阴谋分裂党、反党篡权的野心达到了顶点

高岗、饶漱石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他们制造分裂党反党篡权的阴谋即将得逞，因而，加紧进行他们的阴谋活动。高岗从南方回到北京后，更猖狂地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到1952年12月，毛泽东依照前例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领导工作的时候，高岗就出面反对说：毛主席休假时谁主持工作，应轮流坐庄。他要求改换政务院总理人选，即是要由他来担任政务院总理。

从以上事实说明：野心家高岗、饶漱石的目的就是，分裂党的阴谋为手段，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为此，他们认定刘少奇、周恩来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障碍。因为，刘少奇、周恩来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并担任了政府的主要领导工作。毛主席不在中央时，政治局和毛主席一贯都是委托刘少奇同志代

个人，而在于教育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通过一系列的会议，使全党对这一事件出现的社会历史环境，高岗、饶漱石犯错误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有了深刻的认识，特别强调加强党的团结，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反对骄傲自满等等，对全党的教育是深刻的。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还表现在处理这场斗争所采取的步骤和方法是比较稳妥的。先从高级干部逐步到全党，从党内到党外进行教育。有些同志说反对高饶事件之后，党内民主思想的氛围也受到一定的影响等等，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尽管有这样那样一些问题，总的来说，这场斗争的主导方面是好的，也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加强党的建设经验教训。可惜的是，长时间以来这些经验教训没有被充分重视，并加以运用和发展。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之后，更倍觉这些经验之可贵。在当前我们坚持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政策，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实践中，可以借鉴这场斗争有益的经验来加强党的建设。

工。总之，1956年的工作任务比前三年重得多，有必要安排得更积极些。

此外，1955年农业大丰收，社会主义改造顺利进行，当时看到有利因素多。比1953、1954年的农业生产和社会主义改造形势来说，1955年提供了较为充裕的物质和财力条件以及思想条件。

第二，主观原因

自1955年七届六中全会以后，全党进行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实际上党内已经潜在着“左”倾思想情绪。特别是1955年12月毛泽东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和按语，一股劲地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完全忽视党内正在发展着的“左”倾情绪。毛泽东曾强调地认为：“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在一股劲地反对右倾保守的气氛之下，1956年初“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唯恐本部门本单位犯右倾保守的错误。这样，直接影响到经济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贯彻执行。这是导致1956年经济建设中出现急躁冒进的主要原因。

二、1956年纠正急躁冒进的主要措施及其效果

周恩来敏锐地注意到经济建设中潜在着并开始露头的急躁冒进倾向。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明确指出：“现在，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是要把各项建设事业做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以便使各项事业的发展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适应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主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采取这样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经济建设无疑是十分重要的。面对着已经开始露头的盲目冒进的错误倾向，周恩来、陈云等采取积极慎重的态度，及时地纠正了这一错误倾向的发展，使1956年经济工作减少了不必要的损失。

纠正1956年急躁冒进错误，主要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第一，对1956年度计划草案的过高指标，及时采取了“压一压”的果断决策。

在1至2月间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期间，周恩来两次约李富春、李先念等研究1956年度计划和两会存在的问题，会议结束前夕，2月7日周恩来到会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反右倾保守，轰轰烈烈，这是社会主义的喜

问题。鉴于中国革命的方式是在农村首先取得胜利，党的领导干部中农民出身的较多，将来中央委员会的成分是会改变的。他指出：“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1]我们争取三个五年计划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那时候，我们就会有许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应该有许多工程师，有许多科学家。这是对党的组织建设特别是干部政策提出的新的要求，也是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提出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先导。

这一阶段的错误方面表现在：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会见外宾时指出：“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政治上的‘左’导致1958年经济上搞‘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2]

1957年开始出现“左”的错误，主要反映在政治上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经济上改变了八大关于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终于导致探索道路出现巨大的曲折。

第一，轻率地改变八大关于阶级斗争状况和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开始露头。

首先，错误地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之后，还必须要“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命题是毛泽东在1957年7月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首次提出的。1959年底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时又说过：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使我们搞出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提法。现在看来，这方面的革命是非常重要的。庐山会议实际上也还是进行这个革命，是这个革命的继续，而且斗争是尖锐的。所谓进行一个政治路线上和思想路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采取什么方法呢？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简称为“四大”）。

接着，轻率地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时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理论和实践中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后，这一错误论断支配了全党。

[1]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页。

[2] 《邓小平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页。

这一阶段的错误方面表现在：主要是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使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左”倾理论系统化和绝对化；在实践上进行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运动，既是“左”倾的阶级斗争理论在相当大的范围的错误推行，反过来，又大大发展了“左”倾错误理论，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上，把1957年以来的“左”倾错误越来越升级，使之系统化和绝对化。集中反映在经毛泽东修改和审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上。特别强调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

否定党内对经济形势的正确估计和贯彻“八字”方针的正确措施，错误批判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

对国内政治形势估计越来越“左”，错误规定四清运动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在全国范围内，从1964年夏季起，对文艺界的错误批判扩展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各个领域，对一批我国知名学者错误地戴上“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进行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

第四段：“文化大革命”爆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陷入歧途（1966—1976.10）

从1966年起到1976年10月，我国经历了十年浩劫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实践，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背道而驰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把对我国社会存在的某些阴暗面的估计推向极端，并以此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

在“左”的错误指导之下，对我国基本国情的估量越来越脱离实际，把执政后的党内存在的某些阴暗面推向极端，其集中表现是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它断言：“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受到我们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在这样的估量之下，便认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八大肯定了“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已经同工人农民结成了亲密的联盟”。

五、提出了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和基本内容

八大充分强调了党处于执政地位加强自身建设的极端重要性。邓小平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要求我们十分注意加强党的组织工作和对于党员的教育工作”，除此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

八大明确提出加强党的建设的主要内容是：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为此，特别强调要坚决执行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邓小平报告中还论述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八大前夕，毛泽东在北戴河的一次会议上提出限制国家主席和党的主席任期，得到中央的同意。所以，在八大通过的党章中有一项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这无疑是反映了上述考虑，意味着中央已经开始考虑改变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八大路线是我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八大确定正确的路线，为我们在新时期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指明了方向，为我们在新时期加强自身建设也指明了方向。八大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以及由它产生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及其绝大多数成员都经受了历史的考验。

党的八大是在我国迅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这个特定条件下召开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来得很急促，党的思想理论准备是很不够的，虽然能够作出以上这些正确决策，但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是全党在理论认识上不够成熟，思想统一不够牢靠，方针政策不够具体。表现在诸方面，例如，八

主流是好的。政治上，国家是巩固的，广大群众是拥护我国社会制度大变动的。中国共产党的战斗力很强，党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经济上，由于正确地反对急躁冒进倾向，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是顺利的。1956年底完成了“一五”计划的重要指标，提前和超额完成“一五”计划有了充分把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蒸蒸日上，人民生活安定并不断有所改善。思想上，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健康，富有朝气，社会道德风尚良好。自从中国共产党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后，思想理论界、学术界、文艺界比较活跃。

应该指出，由于国际反共逆流，波匈事件的影响，国内也出现一股反社会主义思潮，极少数右派分子蠢蠢欲动，有些人杀气腾腾，但强大而巩固的无产阶级政权是动摇不了的，推翻不了的。但是，到了5月15日以后，在党的正式文件和领导人的报告之中，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分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这种估计是违背客观实际情况的，突出的表现是严重夸大了敌情。当时曾经提出了500万知识分子中大约有百分之一、三、五至十的右派；提出了大学生中有百分之一、二、三的右派，党员大概崩溃5%；团员崩溃10%或者多一点；全国人口中有10%的人不赞成或反对社会主义，其中有2%左右是最顽固的分子。把极少数的右派分子在某些地区或某些单位的进攻，看成是全国处于“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认为“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又说“一个时期天昏地黑，日月无光”等等。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估计，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有出现“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

产生这样的错误估计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

由于对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社会政治情况缺乏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因而难以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和制定正确的方针及措施。尽管八大前后，党对国内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状况和发展的总趋势作过一些正确的结论，但是，总的看来，还没有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长期存在的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对已经突出起来的但并不属于原来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政治矛盾、文化矛盾、思想矛盾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作出全面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估量，提出一套适应新的斗争需要的工作方法。因此，当出现极少数右派分子进攻时，缺乏冷静的头脑，没有查明问题的来龙去脉，发生在什么范围，什么领域，应该采取相应的方法加以正确的解决，而是照搬长期在革命战争年代大搞群众性阶级斗争的一套办法来处理极少数右派进攻的问题，全国搞“一刀切”，这样势必严重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反右斗争的错误。

由于党在巨大的胜利面前骄傲了，不谨慎了，听不得不同意见，把善意的

功地爆发了第一、第二颗原子弹，它标志着我国尖端科学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农业基本得到了恢复并有所发展。粮食产量接近1957年水平，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大幅度增长，超过1957年水平。农业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大规模展开，初步收到成效。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物价稳定，市场繁荣。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体育也都取得了新的成果。如果说，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建设起来的话，那么应该说，在这十年中，又是调整国民经济的五年做了主要的建设工作，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

第二，贯彻八字方针的经验，至今对我们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的目的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以生产的发展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在调整国民经济期间，我们党把解决好人民生活问题作为第一位的任务。陈云在1961年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吃饭第一，建设第二。陈云同志还强调：“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党的十二大借鉴了这个历史经验，明确地提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是指导我国经济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1]

社会主义建设规模要同国力相适应，要量力而行，搞好综合平衡。党在贯彻八字方针的过程中，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在应当后退的方面作必要的后退，在应当继续前进的方面积极地前进，紧紧抓住计划工作中的综合平衡这个根本环节，从而迅速扭转了困难的局面。党的十二大提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全面高涨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一系列正确的指导方针，就是坚持了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稳步前进这样一个重要思想。

我们党在经济调整工作中十分注意纠正农村生产关系变革超越阶段的错误，相继制定和实行了农业“十二条”和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这些政策规定对纠正人民公社化初期的“左”的错误、稳定农村局势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真正得到纠正，自农业合作化后期以来农村工作的失误不可能得到认真的补救。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实行了拨乱反正，采取了一系列适合我国农村生产力状况的正确政策和措施，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状况才有了显著的变化。党的十二大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总的说来还比较低，又很不平衡，在很长时期内需要多种经济形式的同时并存。”^[2]“近几年在农村

[1]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1页。

[2]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2页。

国法，影响祖国信誉的行动”^[1]竟然发生了。交通运输半年的阻塞，直接对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发生了广泛的影响。为了维持正常的交通运输秩序，1967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对铁道部、交通部实行军事管制，并且从6月1日起，先后五次发布命令、通令和布告，以解决交通运输混乱的严重局势，还派了国防军担负护路任务。

煤炭工业部门，自1967年“一月风暴”之后，便开始“夺权斗争”，生产指挥系统瘫痪，大批工人擅自离开岗位，大规模武斗连续发生，生产急剧下降。到1967年12月，煤炭部直属各矿务局日产水平只达到正常的生产水平的一半左右，比历史上的最低水平还要低。

这两年的大动乱，也给人民文化生活造成莫大的损失。文化、教育领域是“重灾区”，从运动一开始，大、中、小学校就在“停课闹革命”的口号下陷入瘫痪，师生都被卷入这场内乱之中。学校的校舍，图书资料、实验室等教学设施受到极大的破坏。“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等学校连续4年停止招生，研究生停止招生也达12年之久。全国的高所学校在十年内乱中有10.3%停办了。整个社会刮起了一股“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歪风，造成了恶劣的后果，深深地危害了几代人。与此同时，文化艺术事业也遭到极其严重的摧残，在大批所谓“17年文艺黑线”的幌子下，全盘否定了建国以来文化艺术事业的重大成就。在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上，实际上否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林彪、江青一伙给各种形式的精神产品扣上“封、资、修”的帽子，在他们的淫威下，文艺创作走入了死胡同，只能按照其规定的“根本任务”和“三突出”的框子打转，“革命样板戏”代替了一切文艺形式，“百花齐放”的局面没有了，只能是“一花独放”而百花凋零的残局。在这种文化专制主义的禁锢下，扼杀了我国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

此外，整个科学技术、体育、卫生和新闻事业的发展，都受到相当严重的冲击和破坏，造成了恢复艰难，有许多方面在长时间里处于落后状态，国家和人民损失之大是难以估量的。

三、经济建设从困境中转向回升

在社会大动乱中，毛泽东决定派出人民解放军到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实行“三支两军”的任务，对于稳定局势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基于错综复杂的各种因素，从1969年起，我国社会局势暂时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在客观上，

[1] 《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下卷第460页。

有利于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趋向正常。所以，从1969年到1973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4.8%（按可比价格计算）。这种回升，是由于周恩来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依靠广大群众干部共同努力、坚持斗争的结果。但是，其中也反映了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急于求成的问题，这是经济建设中“左”倾错误指导方针占统治地位的必然结果。

（一）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完成

1968年12月12日，周恩来提出组织起来编制1969年计划，随后新成立了由军代表、老干部和革命群众代表参加的起草小组，起草了《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并具体筹备召开全国计划座谈会。这是扭转经济工作无计划、无政府状态一次重大的努力。翌年，2月16日至3月24日四天全国计划座谈会讨论了《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纲要（草案）》，把它确定为1969年计划的主要文件，让各地同志带回去，边执行，边讨论，边补充。

1969年度计划提出五项任务：高质量地全力保证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年内出版一至四卷二千万部，语录和“最高指示”三亿册，要动员四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力发展广播事业；大力加强国防工业、基础工业和内地工业建设；力争三到五年改变北煤南运状况，安排好轻工业市场；继续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继续抓紧交通运输。

1969年度计划规定工业总产值要求比上年增长15%，工业主要产品均要求提前一年全部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规定的指标。基本建设投资193亿元，大中型项目1100多个，其中新建的约130个。编制这个年度计划的指导思想是为党的九大和建国二十周年大庆献礼，又加上缺乏充分的调查研究，因此，绝大部分指标定得过高。尽管当时毛泽东提出“在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周恩来强调，编制计划时，确定生产指标要实事求是，要抓紧控制人口等正确意见。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也难以切实地贯彻。

经过广大群众和干部的努力，这一年工农业生产基本上达到或超过1966年的水平，虽然带有恢复性质，但情况的确有所好转。

1969年工业和基建发展速度和规模迅猛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林彪一伙借口战备，提出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盲目地扩大军工生产，这一年的国防战备费比上年猛增34%，造成了工业与农业比例失调，工业内部轻工业与重工业比例失调，1969年农业与工业总产值比重，农业是36.3%，工业却高达63.7%。而在工农产品产量中除原油产量一项达到了年度计划规定的指标外，其他所有指标均没有完成。这说明，1969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存在不切实际的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的“左”倾偏向，实践证明

他部门也适用。《汇报提纲》许多指导性的正确意见，在全国知识界将产生深刻影响。但由于毛泽东的不满意因而没能批准下发。

邓小平反复强调“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他实行各方面工作整顿的方针，实际上，就是整顿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各条战线，从而恢复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和政策，体现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

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来之不易的。它是1967年2月抗争和1971年底开始周恩来坚持批判极“左”思潮的继续和发展。它是在“左”倾严重错误长时间居于统治地位，同时在“四人帮”握有重大权力的条件下进行的，需要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勇气，既要纠正党和毛泽东的“左”倾错误，又要同“四人帮”的捣乱破坏作斗争，还要克服长期内乱造成的种种困难。邓小平紧紧依靠党内的健康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智慧 and 力量，在较短暂的时间内，全面整顿获得了可喜的成果，促使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

（三）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发动使经济建设再度陷入混乱

如前所说，在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我国经济建设明显好转。但是，好景不长。到了1975年底，形势迅速发生逆转。11月3日，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信件의 批示下达，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由此开始。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刘冰通过邓小平转达给他的信反映迟群、谢静宜的问题是邓小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个判断不是偶然的。因为，毛泽东支持邓小平主持工作，是指望他在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恢复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而邓小平实行整顿的方针，是要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这不仅遭到江青一伙的强烈反对，而且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许。加上毛泽东当时病重，他指定毛远新为他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系员，而毛远新等常向毛泽东作歪曲事实真相和挑拨离间的情况汇报，这对于毛泽东作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错误决策起了恶劣的作用。实际上，这一运动是在“四人帮”直接控制下进行的。“四人帮”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指向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正确的决策。

首先，在政治上，“四人帮”全盘否定1975年的整顿，诬蔑为“复辟”。他们把体现邓小平整顿各方面工作的正确思想的文件，主要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以及《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诬为“复辟资本主义”的“三株大毒草”

负增长4.2%。随后，1969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较大，达到23.8%，1970年又比上年增长25.7%，这带有恢复性质，也包含有不切实际地追求高速度所造成的结果，隐藏着极不正常的因素。按可比价格计算，工农业总产值在这10年间平均每年增长10%的速度，凡是工农业总产值下降的年份，国民收入同样出现负增长，例如，1967年比上年负增长7%，1968年又比上年负增长1.5%。

生产发展速度的下降，意味着经济上的巨大损失。例如1976年大搞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四人帮”肆意破坏。这一年的工业净产值下降5.3%，其中钢产量由上年的2390万吨下降到2046万吨，一年减少344万吨。财政支大于收，赤字296000万元。“四人帮”这一年的破坏，加上1974年和1975年的破坏，大体估计，三年共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四百亿元。据有关部门所作的估算，十年内乱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约5000亿元，连同1958年开始三年“大跃进”所损失的1200亿元。这13年国家损失总达6200亿元。这个数字接近于建国以来新增加的固定资产。从1950年到1983年，我国实际完成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仅包括全民所有制单位）达到8969.5亿元，新增固定资产6440多亿元。^[1]那就是说，这两次失误，使我们国家白白葬送30多年来可再增长一倍的家底。

第二，积累和消费、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又一次严重失调，使我国的产业结构畸形发展。

在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方面，从1970年以后，积累率一直超过30%以上。“四五”时期积累率平均为33%，仅次于“大跃进”期间，比“一五”时期积累率平均为24.2%高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加上10年间生产发展速度下降，而人口急剧增长，10年来全国增加19000万人，相当于一个日本加一个法国的人口总数，由此可见，新增加的国民收入，大部分用以抵充新增加人口的消费也是很有限度的。这样，势必影响人民的正常消费的需要，造成对人民生活大量的“欠账”。

在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方面，由于片面强调三线建设，突出战备，坚持“以钢为纲”，把刚刚调整过来的农轻重协调比例关系又重新恶化起来。首先，表现在重工业投资比重过大，“三五”时期重工业投资占基建总投资的57.4%，“四五”时期占54.8%。这是超过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的比重。同苏联相比，超过其“一五”时期的31.9%，超过其反法西斯战争时的39.8%。这样大的比重，确实在世界上是不多见的。“三五”期间，冶金工

[1] 《光辉的成就》（上），第444页。